

1942/53



▲辛亥首义百岁老人喻育之先生正为本刊撰写稿件。
(严越培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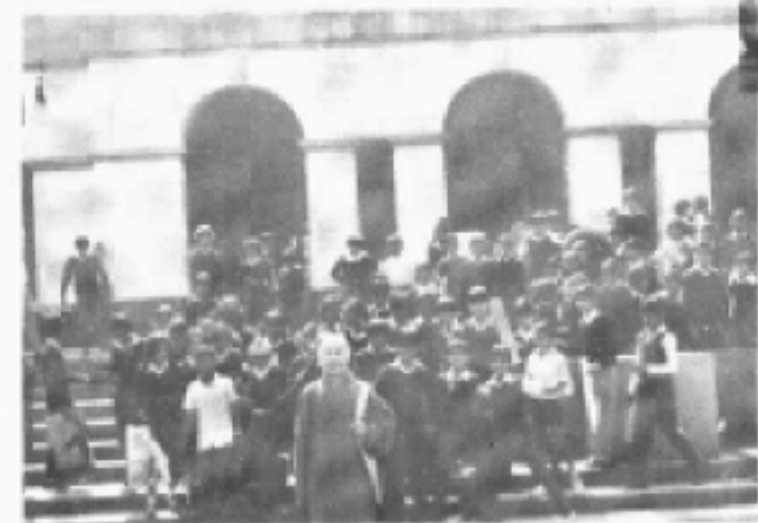
◀ 张学良将军对教育事业大力支持，1934年在武昌创办了育杰中学，培养了不少抗日青年。图为在武汉时的张将军。
(吉士复制)

▼ 1957年初，长江大桥合拢时所拍照片。
(唐寰澄供稿)





1	2
3	4
5	



①归元寺主持昌明法师讲经后，向听众致谢。

②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在全国政协礼堂，寂禅（左一）、赵朴初（左二）与昌明法师互致敬意。

③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及其夫人访华时，参观汉阳归元寺。

④1987年上半年比利时王子菲力普访华，在归元寺门前与昌明法师亲切握手。

⑤1984年昌明法师访问印度，与印度儿童在一起。

一九八八年第二辑 (总第32辑)

科技史话	新闻叙旧	教丛	育谈	谈往录	人 物
记武汉长江大桥正桥建成经过	我了解的国民党湖北水警局电台	张学良将军与武昌育杰中学	犹忆当年艰难创校时 ——记武汉第一师范办校初期片断	我所接触过的冈村、蒋介石和康泽 回忆在蒋经国小组组织中的活动 在国民党陆军总部之所见 徐源泉与东陵盗墓	百岁自述 一水天涯忆李焕 张笃伦及其家人 张笃伦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 爱国爱教的昌明法师 日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
唐襄澄	李义聪	延 焘	关云锦	商金元	程 华
110	106	102	94	83 76 70 57	52 80 26 1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坛桑	体沧	鉴往篇	抗战纪事	训闻	军轶	社会态	社百
从「东亚病夫」到冲出亚洲	建国前参加第七届全运会的回忆	国民党政府军事整编改制的内幕 武汉码头改革纪实	为保卫大武汉出测纪事 「中华魂」战胜了「武士道」 ——纪念陈怀民烈士殉国五十周年 中国空军抗战见闻 武汉沦陷时期的日寇罪行实录	第六军官训练班见闻 回忆中训团武汉分团第七、八军官总队 三十年代高中学生集训的实质	一贯道在黄陂	旧社会的丧葬礼俗	
孙耀华	居彤	徐世江 莫元欽	黄懋胥 徐明庭 周士豪 紫诣进	邓永顺 鲁翊奎 李辰	段耀进	王郁之	
117	121	128 147	154 163 169 174	180 183 186	189	192	

百岁自述

喻育之

编者按：今年1月27日，是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老先生的百岁大寿。1月28日，市政府、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等单位联合举行“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百岁寿辰”祝寿会。有关负责同志以及喻老的亲朋好友向他祝贺。喻老极为高兴，回顾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那漫长的岁月，不禁百感交集。他说：“我经历了几个朝代，今天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好的时光。我虽届百岁，已近垂暮之年，可我常想，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我还要继续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他笑谈以往，追忆旧踪，并由他的外孙女儿林林整理成《百岁自述》，把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和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作了详细的描绘。今发表于此，我们将从中得到教益。

一、青少年时期

我是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2月31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喻家官塘一个偏僻的农村里，父亲喻扬学，是一个憨直、谦和、正派的商人，继承了祖父在黄石港开设的万兴、恒兴、义兴等几家衣庄。母亲阮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

在家庭里，同胞兄妹九人，我排行第三。幼时，父亲送我上私塾。塾师是舅父阮静亭。入学时，父兄及亲友都希望我能进

学中举，出入头地，光宗耀祖。在私塾里，学习内容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只是一味背诵，不作讲解。旧式的封建传统的教育方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不满情绪，但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法先王”的故事很感兴趣。由于勤奋好学，领悟较快，先生常以大器许之。

黄陂县位于湖北省东部偏北，南凭长江之险，北控英山之隘，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相传是为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的故乡。据《黄陂县志》记载：唐宋时期黄陂县一直是南北战争的要冲，这里流传着很多农民起义的历史故事。小时候，我时常听父辈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在脑海里留下“国之不存，何以为家”的思想。

1902年，我随二哥来到汉口，在塾师拔贡李端恒门下继续求学。两年后，我和四位同学一起，又聘请黄冈举人尤嵩甫（声膺）先生教书。尤先生除教《离骚》、《史记》、《汉书》外，并叫我们阅读屈原、司马迁等传记，涉猎群书，使我产生对前辈学者的敬仰和以为师法的念头。

17岁时，我考入北京江汉中学，地址在北京郊区，校长水祖培，是翰林出身。这所中学是由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为赴京应试（考举人）的人筹办的。教员中多为博学有志之士，他们痛恨满清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丧权辱国的行径。向学生介绍西方书刊阅读，灌输民主、自由思想，同时讲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和魏源等爱国志士的英雄事迹，以及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力图振兴中华的“百日维新”、义和团反帝斗争等等。从这里，我不仅学到了近代科学知识，也开拓了我的眼界和胸怀，提高了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坚定我立志救国救民，革旧图新的思想。1908年，我因奔丧，回湖北黄陂家乡。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湖北总督，正

值清朝腐败，外侮日亟之时，张之洞锐意维新，致力图强，除旧布新，力排众议。在湖北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布纱丝麻四局以及许多民用工业。在教育方面，创办了文武学堂，文学堂有经心书院，武学堂有陆军中学，陆军小学等。陆军测绘学堂是在陆军小学停办后，在原附设的测绘班的基础上建立的，地址在武昌左旗（现财经大学东面）。

这时，科举废除，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思想已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有志青年正在寻求救国之路。在黄陂家乡，我亲眼见到中国社会许多腐败现象，差役到处逼粮、逼税，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妇女受到封建制度下的重重压迫，我母亲和妹妹的两只脚被缠得变了形，走路都很不方便。我妹妹竟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同乡的一个傻子结婚，无辜的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社会上强凌弱，富欺贫的现象随处可见，从而激发了我反对满清，振兴中华的思想，决心弃文就武，1910年，我考取武昌湖北陆军测绘学堂。

二、辛亥革命时期

19世纪末叶，外国侵略者纷纷入侵中国，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我国大批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认识到非推翻满清封建统治，才能达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的。武汉地处全国中心，交通方便。经张之洞选派赴日本和欧洲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国后，联合军界人士，秘密建立“日知会”等革命组织，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些革命组织联合归并成为“文学社”、“共进社”，在湖北新军中，约有1/3的官兵，加入了这两个组织。

这时，我正在陆军测绘学堂读书，每日除学习三角（大地三角测量）地形、制图、军事等课程外，夜间，偷阅革命书籍。如《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湖北学生界》等书刊。以后

又进一步阅读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讲稿文章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开始对孙中山先生树立了信仰，也激励着我投身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革命斗争信念。当时学校里，绝大部分同学加入了“共进会”组织，其代表人物是方兴、甘缉熙、李翊东、朱次璋等人。我经同学王寿介绍，加入了“共进会”。同学们经常在学校内秘密地、巧妙地传递革命信息，联络校外新军代表，积极策划起义活动，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

在辛亥起义前夕，测绘学堂内曾发起一场剪辫子的风波。一天晚上，下自习课后，我和同学李翊东、戴维夏等一起准备了几把剪刀，在同学中宣布剪辫子活动，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拥护。男人蓄发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一种风俗。被人们称为“狗尾巴”的长辫子，象征着满清王朝的封建势力对汉族人民的束缚。清朝官吏曾下令“剃前发蓄后辫”，剪辫子就意味着背叛，有杀头的危险。但是同学们已下定决心，就无所畏惧。开始我从寝室拿出一个脸盆翻过来，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圈，我首先在上面签了名，接着，同学们纷纷签名，然后，我转动脸盆，定下剪辫子的先后次序，不到半小时，100多名同学的辫子都剪掉了。事后，大家相互对视，大笑起来，情绪非常高昂。

第二天清晨，校督办（校长）刘邦骥听到同学们剪辫子的消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大声呵斥道：“你们吃大清国的饭，读大清国的书，竟敢这样胡闹，真是大胆已极，姑且各记大过二次，以观后效。”在场的同学毫无畏惧。我心里想，既然敢做，杀头尚且不怕，记大过又算什么！当时，湖北兴办的文武学堂里，除极少数甘当奴仆外，绝大多数人是拥护革命的。此后，剪辫子风潮，逐渐蔓延到其他学校和新军军营，成为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标志。正如孙中山先生宣告的：“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

势。”这时，起义条件成熟，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1911年10月9日，因孙武在汉口楚善里制造炸弹失事，清廷政府军警进行大搜捕，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慷慨就义。恐怖气氛笼罩武汉三镇，城门关闭、交通断绝，清兵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形势非常危急，革命党人被迫策划提前起义。

10月10日清晨，测绘学堂的大门紧闭着，校门口有三十标旗兵巡逻监视。同学们偶尔在操场探望。十五协统王得胜（人称大草包）大声呵斥道：“此刻军警正在捉拿‘革匪’，不与你们相干，你们好好读书去吧！”同学们暗暗骂道：“真是一个大草包，身为协统，却不知道我们都是革命党人”。

傍晚，学校上自习时间，忽然听到自王程八营方向传来的枪声。随后，方兴同学翻墙回到学校，手持两把指挥刀，一把交给李翊东，传令紧急集合，并大声宣布：“今天是驱逐满清的日子，大家随我整队出发，到楚望台领枪。”同学们个个精神振奋，身穿刚发下来的青呢制服，脚穿皮鞋，右臂用白布缠着，以作标志，出校门走在街上，十分雄壮，群众都说：这是孙文的革命队伍。

同学们来到楚望台，打开军械库，每人领得毛瑟快枪一支，子弹若干发。这时，各路起义士兵3000余人联合在一起，公推吴兆麟任总指挥，分三路向清廷湖广督署进攻。测绘学堂同学担任中和门至通湘门的守望任务，以防袭击。时值深秋，夜间，冷气袭人，又一天没有吃饭，大家不顾饥饿寒冷，士气十分高昂。

在拉锯式的阳夏战争中，我们测绘同学也奋勇的参加了战斗。一次，我们队伍由武昌渡江到汉口，路经我家衣店门口，我高兴地向家人招呼说：“我们去打满清！”我二叔闻声赶来，双手将我抱住，劝阻我上前线。我极力挣脱，随队伍前进，并说：“满清不灭，何以家为”。

辛亥起义取得胜利，武昌湖北咨议局前，竖起两面十八星红

旗。

辛亥起义后，在武昌成立湖北陆军测量局，朱次障任局长，我和李南星、范义侠等任科员。任职期间，我深感学识不足，又参加湖北法律专科学校学习。

三、八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来到武汉。孙先生说这次来鄂的目的：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设；三是哀思流离，抚慰疮痍。这次孙先生在汉停留5日，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

4月10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外语专科学校，举行欢迎孙先生大会。到会人员约300人。孙先生身穿长褂，神彩奕奕，来到会场，随同前来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等。孙先生讲话，首先对参加起义军政界同志表示慰问和敬意。接着，作了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说。对革命同志不同意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产生不安情绪，作了说明。他说：“我这次辞职，外间传说我功成身退，其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辞职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二在尽瘁于社会事业；三在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孙先生还说：“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涵意无穷，发人深省。章太炎以双手拍大胯，赞赏不已。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共和万岁”。从此更加深了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信仰，坚定我跟随孙中山先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信念。

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务后，控制军队，实行专制独裁。1914年5月，他又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了一套“新法”。进而以黄袍加身，做起皇帝来。他不惜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1915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卖

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我与测绘局的同志们在局长李翊东的带领下，集会、游行、写文章，呼吁一切爱国同胞，投入反袁护国斗争。军阀头子王占元获悉，下令：“捉拿激进分子喻育之。”我被迫于1916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读书，后进孙中山先生和日本犬养毅先生合办的政法学校学习法律。在这所学校任教的多是日本有名望的学者，如中村进午、器贺堪生等。担任翻译的都是中国留日学生学成尚未返国的人。同学们自己组织了讲义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四川的曾琦、云南的张天放，我是湖北的代表。在校期间，我被推选为留日湖北同学会评议长，旋被推举为会长。

1918年，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充许日本在中国驻兵和指挥中国军队。段祺瑞的卖国行为，激起了留日学生的群起反对，我与同学们一起写标语、游行、示威，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日本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军警到处逮捕游行学生。一次逮捕中国学生百余名，我也同时被捕。在狱中，我毫不畏惧，挥笔撰文警告日本当局，声明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是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在监狱里，有些日本人也是主持正义，反对侵略，支持我们的行动的。最后，日本当局不得不将我们释放。

当年，我国数千名留日学生在王兆荣（四川人，公费留学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带领下，毅然回国，投入国内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行列。

我们回国后在上海，与王兆荣、曾琦、温立等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团长是王兆荣，我任副团长。同时创办了《救国日报》，王兆荣任社长，曾琦、温立先后任总编辑，我任经理。当时，留日学生为了反日，纷纷回国，很多人留住上海。

“留日学生救国团”向各界呼吁，捐款资助回国留日学生的生活

费和《救国日报》的经费。许多爱国人士慷慨解囊，其中赞助最多的是江苏南通的爱国实业家张季直先生。《救国日报》在27个月中，先后出版860多期，销售最多的是南洋印尼等地，我常以“阮恒清”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救国日报》问世不久，不仅日本人视之为中国青年爱国集团排日言论之总汇，也遭到英、法、美帝国主义的嫉恨。法国巡捕房无故抓走了总编辑温立，并扬言要罚款、要封报馆。我立即赶到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情况。孙中山先生非常气愤，说道：“你们办《救国日报》是为了救国，救国就要有勇气，就是杀头也不怕！”我说：杀头我不怕，只怕封报馆。封了报馆，我们就失去了宣传阵地。就是罚款，我们一时也拿不出钱来。中山先生听后，拿出300块钱给我，说道：

“准备他们罚款吧！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总编辑马上会释放出来”。第二天，温立果然被释放回来。以后，中山先生又几次派人送钱支持我们办报。报社同人无不感动，深受中山先生的教育和鼓舞。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在上海期间，我以三民主义信徒和爱国留日学生的身份，到处奔走呼号，唤醒民众，艰难不辞。我被推举为全国学生理事会会长，从事学生运动和宣传活动。

1918年，日、英帝国主义准备进行第三次联盟，蓄意瓜分中国。在沪地黄浦江上，横冲直撞的是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商船；马路上耀武扬威的是帝国主义的军队和警察；矗立着许多高楼大厦的是帝国主义的银行和商号。中国人民无不感到气愤不平。我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全国学生理事会名义与各爱国反帝团体联合，积极活动，坚决反对日、英三次联盟。

一天，我带引3000名学生，准备作宣传演说。受到军警的监视，阻挠。后来，我们找到上海地方法院侧面一块空地，我站在一个木凳上，慷慨激昂地作演说：“英、日两次联盟，中国所受

之害，众所周知。如大家坐视不理，则国家将亡。”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赶来，驱赶集会的听众。这时，后面有人拉我的衣衫，示意我赶快离开，不然会被逮捕。我想到军警多数是北方人，我仍继续讲道：“北方的同胞们！你们也是中国人，国破家亡之际，你们理应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这些北方籍的军警许多是被迫来当兵的，听到我的演说，有所感动，未过分阻挠。在场有许多中外记者采访、拍照。学生们更是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高呼口号，强烈要求政府阻止英、日第三次联盟。次日，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登载消息：“中国喻育之反对英日联盟的行动，引起英政府的重视，经提交国会讨论，否决了三次联盟。”为此，同辈们常以“泰晤士报者”称呼我。这一事实，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窃取更多在华权益的美梦，也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正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救国宏愿。

我第三次会见孙中山先生是在1919年。因《救国日报》在报纸中缝上，刊登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后经读者来信说：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照南兄弟已加入日本国籍，你们《救国日报》向来是主张救国抵制日货的，为什么又为日本货做广告？”经我们调查属实，立即将广告撤除，在原处换上“痛悟”二字。简氏兄弟见报后，大为震惊。托人在报社活动，愿以20万元的代价仍换上他的广告。对此，报社内部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将款收下，以解决报社经济困难问题。我坚决反对。简氏兄弟又请了一名大律师出面，到报社进行威胁。我为此投诉孙中山先生。那位大律师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会议员。中山先生肯定了我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态度，并说要对那位大律师给予批评。此后，那位大律师没有再来。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孙中山先生为国民革命作出重大决策的转折点。我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身份，偕同上海一批学

生、工人、商人代表去拜见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在接见时，勉励大家“言必信，行必果”，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挽救中国。大家深受教育。这是我第四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当时，在上海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革命团体的代表人有：江西的黄介民、安徽的何世桢、湖南的李大军、广西的黄宗汉等。我们朝夕相处，遇有机会，集会通电，号召各地学生及有关团体积极响应。当时参加和响应的团体有：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改造湖北同志会、参战华工总会、上海学生会等。日、英、法等国巡捕房，视上列革命团体为“捣乱组织”，视我们为“危险分子”。

1920年底，我化名阮恒清，再渡日本，历遍长崎、大坂、名古屋、高冈、横滨、东京等地，进行游说，团结反日分子，坚持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懈斗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直到1921年返国。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成立革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主要目标是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

同年，孙中山先生在韶关成立大本营，任命何成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派他到粤军许崇智部担任前敌总指挥，进行东征。我应福建的朋友黄大伟、喻毓西等人电邀，从上海到福建，受到湖北同乡何成濬的热情接待，何委任我为前敌总指挥部军法处长。不久，又改派我为参议，在军中搞政治工作，编辑《军人之友》，并经常到军营中演讲，主要内容是教育官兵效忠革命，爱国爱民，遵守纪律。

一次，福建兴、永、泉自治区负责人许卓然、张干之、杨汉烈三人联名宴请何成濬，邀我一同参加。许等三人向何成濬提出，要我担任兴、永、泉自治区财政处长，经何成濬同意后我到任。

自治区的财政是采取自筹自给的办法。收入靠税收，因当地

种植罂粟甚多，烟土税收较高，财政支出主要是供东路讨贼军、福建自治区的粮饷及其他军民经费。我在任期内，制订了一系列财政制度和措施，免除了一部分苛捐杂税，规定重要财政收支必须经何成濬、许卓然、张干之、杨汉烈四人讨论通过才能执行，并要求官员要保持廉洁，不得受贿。我本人也本着不缺军饷，不浪费一元钱，不滥用一个人的原则办事，时有“黑面孔”之称。

东路讨贼军因长期征战，弹粮供给困难，部队班师回粤。我随即辞去财政处长职务，穿着一件长衫，一双布鞋，于1922年返沪，在沪住在张兰霄开设的印刷馆内。

1922年，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建立28个工会组织，声势很大。该会聘请施洋律师为法律顾问。施洋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举行罢工，与军阀作坚决斗争。

这年9月23日，施洋为参加全国法学会议及逃避军阀的追捕，来到上海。施与我是老友，在武汉时期，常在一起聚谈。施到上海后，住在我处，并要求我引他去拜见孙中山先生。当我同施洋来到孙中山先生住处，中山先生对施洋在湖北领导工运活动，早有所闻。当面对施洋备加赞赏，交谈甚为融洽。我提议介绍施洋加入国民党，中山先生欣然接受。不幸的是，施洋在1923年2月7日大罢工运动中，牺牲在军阀的屠刀下，我闻讯极为悲痛。为了怀念施洋烈士，我在他的家乡湖北竹山县施洋烈士墓碑上，亲笔书写了碑文，以志哀思。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改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鉴于上海、武汉、北京等地远离广州，而且当地政治环境特殊，决定在上海等地成立执行部。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我任上海执行部干事，积极筹办广州黄埔军校招生工作。戴季陶任招生委员会主任，我负责查阅考生试卷和体检等工作。在此期间，我竭力促成和忠实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热情接待共产党人，诚恳地与他们共事，努力排除国民党右派顽固分子的种种干扰。

1924年5月，我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和国民党元老叶楚傖、张继、邵力子等人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直保存到现在，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见证。

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孙中山先生任命潘正道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并指派我任潘正道驻沪联络员。中山先生面将潘正道的派令交给我时，指示：鄂西总司令工作不限于鄂西，可向川东发展，策动川军出师，配合北伐作战。

我于1925年由沪赴鄂西，路经武汉，会见老友董必武同志。董必武与赴鄂西的几位同志早有联系。其中有杨澧（经曲，武昌人，共产党员）、王季侯（治鄂，黄陂人）、董嶽生（董必武之弟）、潘河清（潘正道之弟）等，这些同志与我在鄂西、川东，住在一起，不计地位，不求高薪，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努力协助潘正道工作。

潘正道，字孝侯，黄陂人，系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与川军将领刘湘交谊甚厚。入川后，刘湘加委潘正道为师长，王季侯任参谋长、杨经曲负责政工，我和董嶽生担任宣传工作。在重庆，我和同志们一起创办了《重庆时报》，出刊词是我写的，旨在阐明报纸的性质，主要是鼓吹北伐，唤醒民众，但不涉及党争。与此

同时，肖楚女主编的《新蜀报》与我报异曲同工，彼唱此和。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发动了北伐战争。潘正道联络川军刘湘部队，由川东向武汉方向进军，配合粤汉线北伐军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骁勇善战，势如破竹，席卷湘鄂直趋武汉。我在《重庆时报》主要报导北伐战争进展消息，并写出评论文章，以宣传革命，激励士气，唤起民众。当时，没有电台，对前线消息不灵通，不及时，我从蒋作宾先生处借来几张详细军事地图，根据军事发展趋势和地形情况，自编“战地来电”，一般还能符合战争进展情况。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我和同志们乘船返汉，路经城陵矶时，码头两岸已插上国民革命军旗帜，同志们情不自禁的高呼：“我们终于有了今天！”“国民共和万岁！”。

我第七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1924年，当时，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以争取国家和平统一。11月17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离粤北上，路经上海时，数万名欢迎群众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后，沿途向群众演讲，孙中山先生指出：“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还是要开国民会议，尚须同志们继续奋斗”。他号召大家支持他北上的主张。由于孙中山先生多年来艰苦努力工作，积劳成疾，经检查发现患有肝病。当我和上海执行部的同志们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到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劝孙中山先生以健康为重，暂缓北上。孙中山先生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革命党人是从不计较个人安危的”。在场的同志听后都眼含热泪，深受中山先生忘我精神所感动。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前一次不久后的一天。我和部里的同志们十分担心孙中山先生的健康情况，再次来到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劝说他缓期北上。孙中山先生在病榻上接待了我们，